

危机事件与集体行动逻辑^{*}

林闽钢

内容提要 本文关注危机事件冲击下所引发的集体行动,试图以嵌入性的角度分析这一特定情况下所形成的集体行动的共意性、阶段性和边界性,探讨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人们不会援用搭便车的逻辑,从一个侧面回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之问。

关键词 危机事件 集体行动 SARS

问题的提出

危机事件冲击是一种非预期的因素对社会正常运行的干扰。以 SARS 事件为例,经历了从集体无意识—社会惊恐和集团行动—社会动员多阶段过程。像人类所遭遇到的一切灾难一样,SARS 也是起源于人类集体无意识。SARS 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非生态意识和非健康意识。同样,它的大规模扩散和蔓延也同样归因于此。面对突发危机事件,这种集体无意识让公众不知所措,这是 SARS 在我国发展第一阶段的特征。SARS 在我国发展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引起社会惊恐。当 SARS 开始感染扩散的时候,这些信息并没有在早期的媒体上得以正面披露。相反,广州市民纷纷通过电话、手机短消息和互联网等方式求证事态发展,同时又通过这几种渠道把消息传播出去。一时间内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出于对疾病的恐慌心理,广州出现了抢购板蓝根、白醋、口罩的风潮。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抢购风潮的报道在广东和内地流传。这一阶段,SARS 疫情始终未能被主流媒体所正视。由于主流媒体信息的缺乏和小道消息的渲染,由于不了解它的传播途径和危害程度,公众对它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心理。集体恐惧扩大到一定

的范围和程度,引起了社会惊恐和集体行动,甚至出现了全国部分地区局部“抢购”和“逃亡”过度反应现象。SARS 在我国发展的第三阶段的特征是社会动员。由政府组织发动防治 SARS 的社会动员得到了广泛社会公众的响应,形成了至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社会动员。

集体行动可以看做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对集体行动研究之后,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向一个一般性的假设——即由个体组成的各个群体将按照它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正如单个个体将按照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行动那样——提出了挑战。事实上,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贡献来进行分配,从而扣留没有做出贡献的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的动员将如何产生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人们不会援用搭便车的逻辑。奥尔森提出可以使用强制力或是外在诱因,促使潜在成员参与。于是,奥尔森提出选择性诱因(selective incentives),也就是提供参与者利益而排除不参与者的分享。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SARS 对中国社会影响及应对管理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集体行动的共意性

在奥尔森看来,集体行动可以通过提供选择性激励来实现。在本文看来还可以通过突出强调集体性灾难的威胁来引发。从 SARS 危机事件对我国的冲击所引发的集体行动来看,是属于强调集体性灾难的威胁所引发的共意性的集体行动。共意性的集体行动是指集体行动的目标享有最广泛的态度上的支持(占总人口的 80% ~ 90%),并且没有或很少遭到有组织反对的集体行动。

在危机事件冲击所引发集体行动的早期,积极参加集体行动的成员是那些相信群体能够在个人努力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其他人则一直游离在运动之外,直到他们确信群体行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当这些其他人慢慢接受了群体行动的必要性时,他们将有理由相信,他们的集体命运掌握在群体的手中。这个群体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样信念,即除非大量的人们加入到群体的努力中去,否则没有人能够受益。在这一情况下,每个个体都必须估计由于参加集体行动而导致的他或她的潜在个人损失。这一自我反省并不是作为逻辑一部分而运行的,而是把人们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相分离的个体逻辑。因此,个体可以决定,一旦个体成为群体的一员并接受了基本的群体逻辑——即集体努力将使他们都受益——搭便车问题就会减弱。集体逻辑将在个人关系的背景中取代个体逻辑,在这一背景中,成员之间的个人纽带激活了他们各自对群体的义务。特别是集体性灾难存在使集体有共同的命运感,就会克服搭便车问题的集体逻辑。因此,在此克服搭便车的两个重要条件分别是:其一是“可行性标准”,即除非大多数成员参加,否则没有人能够获益这样一种认识。其二是“贡献能力标准”即人们无法对他们各自的贡献能力做出区分。在 SARS 危机事件冲击所引发的共意性集体行动中,这两个条件都存在。对共意性集体行动来说,搭便车现象更接近奥尔森最初阐述的利益集体模型。

集体行动的阶段性

如果我们假设,对于大多数集体行动参加者

来说,他们普遍都有一种集体命运感以及紧密的人际关系和责任感的话,那么在何种条件下,集体逻辑才会不仅取代了个体逻辑,而且还鼓励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 SARS 危机事件冲击所引发的集体行动首先是社会性的,它们发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中,除了社会建构的纽带和网络,对集体行动的理解要把它放入特定的社会过程中,才是有意义的。

回顾 SARS 危机事件冲击所引发的集体行动的过程来看,可以把它分为:第一阶段:认知解放。即集体行动的潜在参与者出现的意识的转变。在 SARS 危机事件冲击我国的过程中,这一转变的标志是关于 SARS 的传播从小道消息传播发展到主流媒体全面、公开报道,使集体行动潜在参与者对 SARS 有了科学认识和共同认识。第二阶段:公共话语沟通。在 SARS 冲击我国的过程中,大众媒体对于集体行动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从大众媒体来理解集体行动的动员潜力的形成与激活。在集体行动任何的特定时刻,鲜明的行动主题也需要大众媒体的包装。同时,集体行动自身也为公共话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仅是大众媒体的素材而且也影响了媒体讨论的结果。第三阶段:集体行动共意的形成和动员。集体行动共意的形成是指对一个社会行动者来说,有意识地在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体中创造共意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是要产生出一群接受集体行动的理念并参加社会运动的个体。而在集体行动共意的动员中,是要激活集体行动的参与者,集体行动组织要尝试把个体对行动的理解与组织对行动的理解连结在一起,实现两种解释的相互一致且相互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要实现具体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法的合法化。第四阶段:集体行动的集体认同感。集体行动是一种社会建构,集体行动是行动者借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定决策的一个过程。对于集体行动来说,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形成一个集体认同感。为了形成集体认同感,一个群体必须把自己界定成为一个特定群体,而它的成员则必须发展出关于集体行动的共享观点,发展出共同目标。

集体行动的边界性

集体行动的边界标示了群体关系的社会领地, 边界标记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形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它促成了人们对群体共同体的更深认识, 并架构了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但正是集体认同感的生产, 引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一旦某个集体行动组织尽力去构建一个认同感, 它就很难控制对该认同感的消费, 除非这个认同感是高度排他的。在这个意义上, 集体认同感变成了一种公共物品, 所有人都可以消费它而无须为它的生产做出贡献。我们发现, 随着嵌入于群体中的行动者这一研究角度的出现, 搭便车问题失去了其重要性。在 SARS 冲击所引发集体行动过程中, 因为任何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或潜在的参与者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 特别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人们主要的社会网络往往与他们生活的地域空间大部分重合。也就是说, 在一定区域内集体认同感不仅是社会网络传递的内容, 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被当作选择性激励来使用, 促使集体行动的边界更加明显。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 SARS 危机事件冲击期间, 农村地区一些乡村在全国共同防治 SARS 集体行动中, 自己断路设卡把乡村与外界自行隔离的做法, 并赢得绝大部分居民的支持。所以, 嵌入性这一角度所看到的是个体通过即存的纽带和群体亲和力嵌入于集体行动的程度。否认这种嵌入性的存在, 不但歪曲了选择过程的本质, 而且使得理性选择取向的研究不可能看到一整套在许多场合中起决定作用的选择性激励。

结语

(1) 通过分析 SARS 危机事件, 我们可以发现当以下四个条件得以满足时, 我们就可以置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逻辑于不顾了。其一, 一种强烈的群体命运感; 其二, 相信群体作为一种策略的可行性。其三, 个体无法按照他们的贡献能力把自己和其他群体成员区别开来; 其四, 群体成员之间的紧密个人纽带, 足以在面临搭便车的冲动时, 激活群体责任感。

(2) 通过分析 SARS 危机事件, 我们发现一个特定的集体行动要实现一定的目标并取得成功, 需要获得在五个结构性的因素支撑: 其一, 广泛的政府支持; 其二, 运动组织的有效领导; 其三, 基础性支持的联合, 包括市民组织和各种网络及其资源的整合; 其四, 大众媒体全面、公正报道; 其五, 慷慨的制度化资助。其六, 广泛的公众支持。

(3) 通过分析 SARS 危机事件, 我们发现信息公开和透明的大众媒体政策非常重要。世界上各个国家大众传播媒介通常情况下都是作为公共部门存在, 信息传播权力也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大众媒体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公共色彩, 使得它承担着舆论导向和稳定社会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 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若仍采取传统的“外松内紧”的策略, 人们通常面临着知识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对称性, 如果无法从正式信息渠道得到官方消息, 各种消息就会通过非正式渠道迅速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传播就往往有失真性、放大性和快速性, 容易加剧人们的恐慌。

(3) 通过分析 SARS 危机事件的社会后果, 我们发现 SARS 等传染性疾病是一种具有社会性影响和很强外部性的公共风险, 具有关联性、不可分割性和难以识别性, 这种公共风险不能像私人风险那样通过市场机制来防范和化解, 而只能按集体行动的逻辑由政府来应对。政府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就在于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与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是内在统一的, 公共产品存在的最终合理性在于抵御公共风险。市场机制与私人风险相适应, 政府公共产品与公共风险相适应。

参考文献

1. 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艾尔·莫里斯、卡洛·麦克拉克·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3. 刘一泉:《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观》, 《战略与管理》1999 年第 4 期。

作者简介: 林闽钢, 1967 年生, 社会学博士,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陈如勇〕